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选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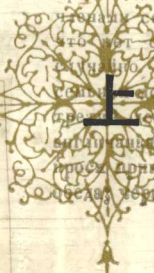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文学名著

Все счастливые семьи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каждая несчастная семь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 по-своему.

Все смешалось в доме Облонских. Жена узнала, что муж был в связи с бывшею в их доме француженкою-гувернанткой, и объявила мужу, что не может жить с ним в одном доме. Положение это продолжалось уже третий день и мучительно чувствовалось и самими супругами, и всеми членами семьи, и домочадцами. Все члены семьи и домочадцы чувствовали, что нет смысла в их сожительстве и что на каждом ностальгическом шагу он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люди более связаны между собой, чем они, члены семьи Облонских. Жена не выходила из своих комнат, муж не появлялся в доме. Дети бегали по всему дому, как потерянные. Анна была в ссоре с экономкой и написала записку приятельнице, прося у нее новое место; повар ушел еще вчера со двора; во время обеда горничная кухарка и кучер просили расчета.



## 译 本 序

《安娜·卡列宁娜》问世一百多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云的变幻，这部出自巨匠之手的艺术杰作，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显得更为瑰丽。而当它出现之初，却曾招致不少的非议。令人诧异的倒不在于有关内容的品评。任何反映当前生活的作品<sup>①</sup>，是难免激起不同的反应的。令人诧异的是对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示怀疑。其中问题之一就是所谓缺乏结构。

构成小说的是两条平行的线索，安娜的线索和列文的线索。一些人对此提出责难。先是有人批评小说中包含有“平行发展、毫不相干的两个主题”，缺乏“建筑术”；继而有人说托尔斯泰写的是“两部小说”；后来还有人认为“康斯坦丁·列文的故事”是“勉强插入安娜·卡列宁娜的故事”里去的。这些论调后来在欧美评论界得到不止一次的回声<sup>②</sup>。

作家自己早就委婉地反驳了这种批评。他说，这部小说不仅不是没有结构，他却正好以结构做到天衣无缝而感到自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圆拱衔接得令人觉察不出哪儿是拱

---

① 《安娜·卡列宁娜》写于1873—1877年，涉及的主要是七十年代的事，它反映的正是当前生活。

② 美国的亨利·詹姆斯、法国的布尔热都指责托尔斯泰的作品没有结构。德国的批评家查别尔在《安娜·卡列宁娜》德译本序言中说：小说散成了两部分。

顶”。这个结构不依赖情节或人物的关系(交往),而是依赖“内在的联系”<sup>①</sup>。然而,这“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呢?通常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根据作家自己说的,是“家庭的主题”<sup>②</sup>;另一也是根据作家说的,是“作者对事物的独特态度的一致性”<sup>③</sup>。二者固然各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前者不够全面,后者比较抽象,因而还得进一步问:这“内在的联系”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原来只想写一个出身上流社会已婚的女人的故事。她“失足了”,但却是“无辜的”<sup>④</sup>。这个萌生于一八七〇年的构思,体现在三年多后开始写的初稿里,它“几乎专门发掘一个主题——‘家庭的主题’”<sup>⑤</sup>。但是,恰好在写成初稿前后,在一八七二至一八七四年,托尔斯泰“进入了新的热情探索和激烈矛盾的时期”<sup>⑥</sup>。列宁在论托尔斯泰时说:农奴制改革后“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sup>⑦</sup>这个“旧基础”的破坏从七十年代起特别加剧,作家的世界观也开始受到强烈震荡。于是,专写一个女人情欲发展的原先构思,在他看来是“十分讨厌的了”。他对小说作了很大的增改,改变了安娜的外表和精神面貌,加强了列

---

①③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61页,第286页。

②④ 《索·托尔斯泰日记》,苏联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502页,第497页。

⑤ 尼·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70—1881)》,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第294页。

⑥ Б·艾亨巴乌姆:《列夫·托尔斯泰(七十年代)》,苏联文学出版社,197年,第135页。

⑦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6卷,第330页。

文的线索。小说的重心转移了。现在，它表达的是激动作家的重大社会问题，即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在当时俄国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它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贵族阶级在思想上资产阶级化，导致道德败坏，家庭关系瓦解；另一是农业受资本主义的破坏，贵族经济没落，农村中阶级矛盾激化。

可以认为，小说的原来的开场白<sup>①</sup>：“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宗明义，是全书的钥匙。它是这样展示作家的思路的：名门贵族奥布隆斯基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腐蚀，造成了家庭的“混乱”，他家的“混乱”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安娜到莫斯科、她和弗龙斯基相遇、列文求婚被拒绝、基蒂被抛弃，于是卡列宁、谢尔巴茨基以至列文和弗龙斯基等家庭一下子都“混乱”了。从此，两条线索就并行展开，作家让安娜和列文——两个正直的、“有心灵的”人物在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里寻求个人幸福的道路：安娜回到彼得堡，在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渊藪里，在上流社会的影响和排挤下，最后毁灭了；列文回到农村，在保持宗法制古风遗习的环境里，在劳动中和同淳朴的人民交往中，终于找到了“出路”。这“出路”是作家给当时社会所开的“药方”，也是对安娜的探索所作的回答。

圆拱的拱顶看来也就在这里。

当然，不能说这部巨著的内容给这两方面囊括无遗了。作家说：《安娜·卡列宁娜》是一部“广阔的、自由的小说”，“可以不费力地把我从新的、不平常的、于人们有利的角度来看所理解的一切，完全写了进去。”<sup>②</sup>在小说里，托尔斯泰以大艺术家的

---

① 现在的开卷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在原稿中曾是第一部的题词。

②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237页。

才能，把他所观察到并使他激动的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照事物的固有联系，巧妙地同人物的活动组织在一起，从而展示了时代的多方面的矛盾。在这里，广泛地涉及家庭、伦理以至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哲学等问题。无怪乎托马斯·曼把这部小说称作“现代史诗”；格·乌斯宾斯基则认为：从这部小说可以研究“当代俄国生活、当代俄国思想倾向以及全部俄国人”<sup>①</sup>。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谈两条线索的主要人物，而以安娜为重点，因为在国内外，关于她都有颇为不同的看法。最后还联系列文谈谈作家当时的世界观问题。

安娜的形象引起争论不是偶然的。她身上交织着很多矛盾，作家的观点又相当隐蔽，书前关于她的题词更玄奥费解。因此这个形象宛如笼罩在迷雾里。

在小说最初草稿中，安娜是一个其貌不扬、品德不佳的女人。她为情欲所吞噬，抛弃了自己的温和而善良的丈夫。她最后自杀是可怜的，却不能说是悲剧。而现在的安娜则具有悲剧人物的品质。她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烈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

在八年前，安娜由姑母作主，嫁给那时当省长的、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出于家长之命的婚姻，是宗法制社会的传统。也许，这正是她安之若素地和卡列宁一起生活过八年的原因。在八年间，据安娜说，她“努力”爱丈夫，后来实在不能再爱他了，便去爱儿子。作家则告诉我们，她每逢欢乐和愁苦，都是“立刻”向丈夫诉说的。可见她同丈夫即使不

<sup>①</sup> 《格·乌斯宾斯基文集》，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第6卷，1957年，第297页。

怎么亲密，至少还是和睦的。

安娜的出嫁约莫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不久。到了七十年代，象在小说里看到的那样，社会经历了陵谷变迁：“新生活的主人”、商人里亚比宁鲸吞着贵族的地产；皇室后裔、公爵奥布隆斯基趋走于犹太人的门庭。社会一切旧有联系的松弛引起一切因袭观念的动摇，从而也自然地提出了婚姻自由的问题<sup>①</sup>。俄国正是在七十年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问题特别尖锐<sup>②</sup>。书中也谈到：“近来世风日变”，大家认为应该抛弃“旧习惯”，让青年人选择自己的婚姻。安娜不同于一般少女，既已出嫁又有了孩子。但新时代的气息却使古井的死水也卷起了波澜。同弗龙斯基邂逅，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发出了强烈的心声：“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在跨越礼教的樊篱之前，安娜是不无一些犹豫的。为了避开弗龙斯基，她提前离开莫斯科。但是在火车上读英国小说时，她怎么也不能静观“生活的反映”，她要求自己生活的渴望像暴风雪那样掀了起来。回到彼得堡后，她如梦初醒地看到痛苦的现实真貌：丈夫的招风耳，他机械而做作的一言一行。她徒然想说服自己照旧生活，但已是不可想了。

安娜和弗龙斯基从初恋到结合，经过了一年多，但小说只是几笔带过，因为这幸福的高潮，她几乎是平稳地达到的。此后，她的生活就充满矛盾了。

和安娜冲突的首先是卡列宁。这是彼得堡的显要官僚。他的功名心淹没了活人的感情，他的官僚生涯养成了只重形式、不

---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94页。

② 参阅H·阿尔坚斯，《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苏联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354页。

问实质的思维方法。他头脑僵化，思想保守，害怕变动无常的生活，固守僵硬的道德、法律和宗教的观念。安娜骂他是“机器”，是“木头人”。实际上，他只知道法定的婚姻，而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只知道安娜是妻子，从没想到她是个需要爱情的女人。他是如此麻木不仁地摧残了她的八年的生命。特别是，他知道安娜不忠实后，却以她不在家里会见情人作为条件，坚持同她住在一起；他要同她离婚时，却非得从她手中夺走孩子，尽管他并不爱他。两者都为了惩罚安娜，前者却同时是为了自己“体面”。他这样做，丝毫也不认为这是残酷和不道德。因为他受旧的虚伪的道德观念的支配，而这些作为并没有越出虚伪道德所允许的范围，所以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责任只在安娜一边。他正是旧社会旧观念的代表。安娜同他的冲突，不只是性格冲突，而且是同旧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卡列宁的可怕也就在这里。饶有意思的是，当他一反常态，以宗教感情宽恕了安娜的时候，他自己也被这个社会所唾弃，成为孤独无依的笑料。最后他拒绝离婚，是安娜致死的原因之一，但这却假手于朗德的降神术。这看似荒诞的命运的力量，体现的是“慈善虔诚”的贵夫人利季娅的意志，因而同样是当时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的力量。

显然，安娜面对的正是当时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这个贵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是当时俄国经济不发展所造成的这两个阶级的混血儿。在这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所带来的社交公开给勾引和通奸开拓了方便的途径，而旧的封建阶级所残留的礼法大防又迫使他们蒙上薄薄的面纱。这里弥漫的气氛既淫荡又虚伪，因而也特别无耻而可厌。安娜同这个社会冲突，不是因为她不道德，而是因为同这里的妇女比起来是太道德了。这

里的贵夫人们早就听厌人们称道安娜的贞洁，所以幸灾乐祸，准备好一把污泥，等待时机一齐向安娜掷来。安娜像她们一样也有了“影子”，她们都感到真诚欣慰；安娜敢于把秘密关系公开，她们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她们虽然比她“坏上千百倍”，却把她排斥在彼得堡社交界之外。到剧场的一幕，是安娜同这个社会冲突的总爆发。但她失败了。从此她似乎被“放逐”了，过着同这个社会隔绝的生活，陷于精神上的绝境。

安娜之死，弗龙斯基也是不能辞其咎的。弗龙斯基是改革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所诞生的畸形儿。他兼有封建阶级的“慷慨”和资产阶级的吝啬，作为贵族大地主而又经营资本主义农业，既有顽固的贵族气派又有自由主义思想。他把人分成新、老二派，他就是新派。他的一套“准则”，正好是自由主义贵介公子的准则。他就是这种社会力量的典型，是“贵族子弟最出色的典范”。他也是“善良”的，不过是以他的“准则”来衡量的。他追求安娜，开始就是受他的“准则”指导，是为了享乐主义和虚荣心的满足。在安娜的爱情的感应下，他的情感变得严肃专一了。但他始终只吸引于安娜的外貌，而并没有窥见安娜的精神境界（像米哈伊罗夫在肖像画中所展示的）；他只知道和安娜寻欢作乐，从来不体贴她内心的母爱和爱情的痛苦斗争。所以他同安娜的关系，不是爱情，而是情欲，而情欲是不能持久不衰的。与卡列宁相似，弗龙斯基也有强烈的功名心。追求安娜到手后，暂时蛰伏的“功名心的蠕虫”就觉醒了。如果说卡列宁只把安娜看成妻子而不把她看成女人，那么弗龙斯基则只把安娜看作女人而不把她看成妻子，因为他不能忍受家庭的桎梏。只有在思想上受到重大震荡，开枪自杀之后，他才决心抛弃前程的考虑，同安娜出国旅行。在意大利，安娜感到“不可饶恕的”无比



的幸福，而在他却只是幸福之山上的一颗沙粒。安娜抛弃己自所有的一切，包括名誉、地位、家庭以至心爱的儿子，来换取他的爱，而他的爱却已逐渐冷却，被厌烦所代替了。各种活动无法抑止百无聊赖的心情。回国以后，由于他抛不开社交界，见逐于社交界的安娜更成了他的重负。他不能了解安娜的莫名其妙的妒意，因行动受到约束而愈益不能忍受。于是爱情变成了憎恨。安娜最后理解到，即使她能离婚而同他结婚，不要说幸福，就是免于痛苦，也是不可能的。上流社会仿佛假手于他完成对安娜的最后一击。

由此可见，造成安娜悲剧的，是整个上流社会，包括卡列宁和弗龙斯基。她遇上他们两人是偶然的，但在这个圈子里不可能遇上别样的人物，因此偶然性包含有必然性。安娜在吹灭人生蜡烛之前的内心独白：“这全是谎言，全是虚伪，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就是对这社会的控诉。

但是，不能因此简单地把安娜理解为外部罪恶世界的牺牲者。安娜的悲剧还有其深刻的内因。

当安娜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同弗龙斯基结合时，托尔斯泰曾用泼辣的笔墨来描写她的矛盾心情。这里有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久久压抑的强烈感情的满足，有一个贞淑的妇女冲决礼法堤防而未免内疚的羞耻心，有一个善良的妻子因不忠实于丈夫而问心不安的负罪感。出版家卡特科夫曾要求冲淡这里的“鲜明的现实主义”。作家断然拒绝说：这一章“分毫不能更动”。“这是整个小说的立足点之一。假如它虚假，就全都虚假了。”<sup>①</sup>可以认为，在这内心激烈搏斗的时刻，集中地表现出她的性格特

<sup>①</sup> 《列·尼·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第17卷，1965年，第411页。

点，她的强烈而复杂的感情。安娜的悲剧，她的“长期的不幸的生活”的内在根源，从积极方面来看，正是这些由于她的真挚善良和纯洁所产生的复杂感情。

羞耻心：安娜追求爱情并得到满足，本来是“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生活的。但她始而感到“精神上的裸体”，几乎无地自容；后来时常因为“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深感屈辱。她奇怪贝特西虽然同别人有秘密关系，却“完全不算一回事”，而她却因不能及早了结自己的暧昧处境，备受精神上的折磨。

负罪感：安娜厌弃丈夫，却又再三说他是“善良的人”，不同情他，说自己“对不起他”。她甚至希望自己一死，让自己、弗龙斯基以至卡列宁都得到解脱。在病危的时候，还向丈夫忏悔，要丈夫“饶恕”她。也正是这种心理使她不能接受卡列宁的“宽容大量”——允许她离婚并把儿子给她，因为她认为这将使她在道义上低于他。她因此失去同弗龙斯基结婚的机会，虽然结婚也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

强烈的感情：安娜热爱谢廖沙，像爱弗龙斯基那样，胜过爱自己，而二者不能两全，因此她不愿离婚，含垢忍辱，甘当一个情妇。离家之后，怀念之情更长期吞噬着她的心灵。安娜把爱情看得十分严肃，赋予它以“太多的意义”。这种感情集中专一，因而极其炽烈，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把它比作火焰。正是这种熊熊的烈火，烧毁了“神圣的”婚姻关系。但这烈火也是一种难以制驭的力量，使得她要求弗龙斯基“完完全全地献身”于她——永远热烈地爱抚她，而且总是感到“不满足”。这里已经走向事物的反面了。

有人认为安娜是“善和美的世界”的体现者。这是难以同意的。安娜性格中是有弱点的，固然有些弱点是同她的品德联在

一起的。安娜是留里克皇室的后裔，是彼得堡上层社会的贵夫人，尽管她鄙视这个社会，却不能离开它，因为她不能进入别的社会，她踌躇许久，“没有力量”拿她的“社会地位”去换取抛开了丈夫和儿子投奔情人去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她去剧院似乎是向社交界挑战，却正表明她不能忘怀这个社会。她也摆不脱这个社会给她的旧道德观念的束缚，而她的道德感情更加重了这种精神枷锁的负荷，她的过分的羞耻心和负罪感就是由此而来。而最重要的是，她生长于这个社会，虽然出污泥而不染，却也无缘接触到正面的理想。所以她所追求的爱情，并没有真正的内容。如果说她受时代之赐，比普希金的塔季扬娜前进一步，那么较之屠格涅夫的叶琳娜就缺乏理想的憧憬。她只是倾心于弗龙斯基的仪表、风度及其慷慨好施，并不想逼视他的内心世界。这是“盲目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情。她后来甚至不惜用姿色的魅力来编织“爱情的网”，成为弗龙斯基的“无条件的奴隶”！也正因为缺乏理想，所以兴趣非常狭窄，把爱情等同于生活。我们知道，冈察洛夫的奥尔迦，对幸福的但却是空虚的家庭生活感到莫名的怅惘，而安娜却只渴求这种空虚的“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确实是“过于托尔斯泰式的人物”，托尔斯泰是离不开家庭生活而想像妇女的存在。应该说，作为上层贵族中已婚的贵夫人而追求自由的爱情，她的行为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深入。但她没有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薇拉那样寻求社会出路，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也还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安排什么出路。这是她的精神悲剧！

安娜的性格是有发展和变化的。这在达里娅的眼里看得很清楚。安娜在开头，在同卡列宁的周旋中她使用虚伪作为必要的手段，虽然博得我们同情而她却常常内疚；而后来，她渐渐

习惯于“虚伪和欺骗的精神”，以致说起谎来“又简单又自然”，从中得到“一种乐趣”。她甚至不惜向她遇到的青年人一一卖弄风情，以逗起弗龙斯基的妒忌。她的爱“越来越强烈”，却“越来越自私”。如果说她抛弃谢廖沙“来换取别人的爱”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她对自己女孩漠不关心就难以理解了。“她心灵里最好的成分”的确因她所过的生活“很快就被湮没了”。

当然，安娜始终高于彼得堡上流社会，只不过现在，她的品德只赖和上流社会对比而显示，而非独立存在的了。

格·乌斯宾斯基谈到七十年代俄国时说：“近年来自杀狂像一朵乌云似的飘过整个俄国社会”<sup>①</sup>。另据托尔斯泰夫人回忆，在一八七二年，在他们家庄园附近，曾有一个情妇因妒忌投身铁轨自杀<sup>②</sup>。对安娜的处理，作家可能是从生活得到启发。但安娜的自杀，却是这个性格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是感情强烈的她丧失了吞没一切的“自私”的爱情之后唯一的出路。当时有人说作家未免残酷；后来有人还认为安娜“有强烈的生活愿望的乐趣”，让她自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sup>③</sup>。托尔斯泰自己则说：“他们做了现实生活中必定会做的事，而不是我想要他们做的事。”<sup>④</sup>

与安娜有关的是书前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出自《圣经》的题词，作家最初是从叔本华著作中转引的。据尼·古谢夫说，在叔本华那里的解释是：任何人无权评判、报答和惩罚别人，存在着“永恒的审判”。托尔斯泰就是这个意义上使用题词的<sup>⑤</sup>。

① 《格·乌斯宾斯基文集》，第3卷，1956年，第223页。

② 她的名字也叫安娜。见《索·托尔斯泰日记》，上册，第508—509页。

③ 高尔斯华绥：《〈安娜·卡列宁娜〉序》，见《托尔斯泰和外国》，《文学遗产》第75卷，1965年，上册，第143页。

④ 转引自Э·巴巴耶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当时俄国刊物》，第135页。

⑤ 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70—1881)》，第343—344页。

他说过：“……人做的坏事，其后果将是所有那些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的痛苦，安娜·卡列宁娜也感受到这痛苦。”<sup>①</sup>这就是说，安娜破坏了道德，然而，不仅上流社会，就是作家自己都无权审判她。她的自杀体现了永恒的审判。另据艾亨巴乌姆的解释：“作家最初要把一个女人写成恶和淫乱的化身；但小说超出了原先的狭窄范围，并复杂化了。托尔斯泰明显地动摇于恶与罪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根据叔本华的伦理学，他仍然认为安娜和弗龙斯基是有罪的，不过不是对社会或社会舆论，而是对生活、对永恒的审判而说<sup>②</sup>。这些说法可能是符合作家的原意的。显然，这个题词表现了作家思想上的矛盾：他对安娜既同情又谴责，而上帝则不过是他的观念中的旧道德的体现罢了。如果从形象本身来看，我们倒同意魏烈萨耶夫的解释。他说：安娜追求真正的爱情，是活的生命的要求。但她却怕人谴责和失去上流社会里的地位，她使光明磊落的感情沾染上虚伪，她还沉溺于爱情甘当一个情妇，因而只能默默无言地俯首接受最高法庭的审判<sup>③</sup>。

与安娜不同，列文和基蒂是以爱情为家庭生活的基础的。乍然看来，列文的家庭幸福和安娜的爱情悲剧适成鲜明的对照。基蒂陶醉于“儿童室、尿布和家务”，这个形象是缺乏诗意的，托尔斯泰却以她和达里娅——古道可风的谢尔巴茨基家的两个女儿同安娜对立，把她们作为理想家庭的妇女的典范。然而，他

---

①② 见Б·艾亨巴乌姆：《列夫·托尔斯泰（七十年代）》，第167页，第171—172页。

③ 同上书，第166—167页。据魏烈萨耶夫的回忆，他在1907年春天曾托苏霍青将这种见解转达托尔斯泰，问是否符合他的原意。后来苏霍青回信说，托尔斯泰很赞赏这种看法，但认为不是他原来的想法。

并没有浪掷笔墨专写甜蜜而平庸的家庭生活。他深刻展示，在大转折的时代里，列文虽然得到个人幸福，但却依然是不幸的。于是我们又看到列文悲剧和安娜悲剧的相互烘托。

列文和安娜一样，他们的悲剧的始因都在于“有心灵”、有道德感情；在当时社会里，不能像周围人们那样醉生梦死，过不合理的生活。安娜不甘效法贝特西们那样安于欺骗与无耻，列文也不能追随奥布隆斯基之流享受“不公正的特权”而“问心无愧”。他们都为摆脱难以忍受的处境而探索出路。有人认为，安娜的悲剧来自同社会的冲突，而列文的悲剧则是内在的，可以说是精神上或世界观上的悲剧。而实际上，列文是在更广泛范围内同社会冲突。显然，安娜主要在家庭和伦理领域，列文则主要在社会和经济领域。

列文是外省的贵族地主。他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却又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他不满足于上流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却又认为奢侈是贵族的本份，只因他们“太天真”把土地廉价卖给商人而感到难受；他向往于贵族阶级的古风遗习，甚至同意一个旧农奴主不满农奴制改革的看法，却又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压制农民；他认为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却认为自己的地主收入是从劳动得来的东西；他不愿同商人握手，认为他们比仆役还要下贱，却很尊重农民，并自命为人民的一分子。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见解，除了阶级偏见外，主要是来自理想化的宗法制社会的思想。

列文确切地捉摸到俄国六、七十年代的脉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前者指农奴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后者指资产阶级制度）。他因贵族阶级在他所憎恶的新兴资产阶级进逼下急遽没落而十分愤慨和激动不安；

他看不到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积极作用，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只能给社会、给农业经济带来灾害；他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说俄国“在规律之外”，虽则他自己在农业经营和思维方式上都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印记。另一方面，他因自己的富裕同农民的贫困比较起来很不公平而经常有负罪感。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他要求自己勤劳俭朴。他一直探索与人民接近的道路。他参加割草劳动，在草垛上过的那一夜还曾幻想去过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过，他赋予劳动以诗意，并未理解农民的痛苦处境及其合理要求。而且尽管他清醒地看到，地主经营的农业之所以无法改进是由于农民不合作，而他自己的农业经营，则不过是他和劳动者的“残酷的”斗争；他却幻想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吸收农民当股东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缓和阶级矛盾，并要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俄以至全世界。总之，他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幻想阶级调和，要回到宗法制社会，这些思想或理想是唯心主义的，违反历史前进运动的，因而注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他的主观上善良的愿望，没有得到农民的信任。失望之余，他怀疑人生的意义，从社会探索转到思想和道德的探索，在哲学和宗教著作中寻求答案，但也徒劳无补。面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甚至要以自杀解脱。最后，他从农民费多尔那里获得启示：“为了灵魂而活着”。他的不安的心灵于是得到了归宿。

从社会矛盾逃避到自我修身，这种“出路”纯然是一种幻想，它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列文虽然“爱一切人”，却依然做他的地主：不仅“照旧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旧还会和人争论”，而且照旧还会同劳动者进行“残酷的、顽强的斗争”。但是，从列文这个性格发展来说，这样结局是合乎逻辑的，这种空想

也是一种“出路”。要知道列文还没有摆脱地主的立场，他的社会探索主要是从自己利益亦即地主利益出发，他的思想探索也主要以拯救自己灵魂为宗旨。作为“善良的”老爷他表示对农民的同情，却并没有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要求改变社会制度。因此只要心灵上安宁，也就得到自己的归宿。

这里附带谈谈作家的思想发展问题。

在托尔斯泰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不少人物带有自传的性质，各自反映了作家的一段思想历程以至生活历程，其中列文是最富于自传性的。列文的许多活动可以在作家生活中找到印证，他的一些想法几乎逐字逐句地来自作家的日记、书信和某些论文。据说列文这个姓也可能由列夫演化而来(Лев—Левин)<sup>①</sup>。而最明显的是，列文的思想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两次思想危机。

托尔斯泰的第一次思想危机，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其主要原因是农奴制改革前后革命形势的影响，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过去而趋于缓和。但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则是一八六〇年秋作家长兄尼古拉之死引起他思考人生意义，而使他摆脱这种绝望的，在作家看来是家庭幸福，即他在一八六二年的结婚。在小说里，最初引起康斯坦丁·列文思考生和死的问题的也是哥哥尼古拉·列文之死。关于他死的这一章作家非常重视，在全书里只有这一章有一个标题：“死”。小说写到，是妻子的爱把康斯坦丁·列文“从绝望中救了出来”。本章以基蒂的怀孕结束，暗示着生战胜死。

从七十年代初起，在《安娜·卡列宁娜》的写作期间，托尔

---

<sup>①</sup> 尼·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70—1881)》，第296页。



斯泰就已酝酿着另一次思想危机。其直接原因是在家庭生活方面，他子女亲戚的接二连三的死亡。基本原因则是在社会方面，是“旧基础”的激烈破坏。当时俄国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国际上的巴黎公社，国内的涅恰耶夫事件、彼得堡罢工、民粹派“到民间去”等等也起了一定的影响。据说，从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托尔斯泰在农村，几乎离群索居。甚至在一八八〇年，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还说：他作了很大努力，以求“政治生活的旋风”不致把他“刮走”，使他“迷路”<sup>①</sup>。在这段时间，他充满着悲观情绪，不时在书信里谈到生命的虚幻，谈到涅槃和死亡。一八七五年，他的夫人在日记中写道：“我很痛苦，我不忍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忧郁、颓唐，整天整星期地坐着不做事，不干活，无精打采……这仿佛是精神上的死亡。”<sup>②</sup>后来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也谈到当时的情况说：我感到绝望，“我不知道我该怎样生活，我该怎么办。”这种绝望越来越经常，在写完《安娜·卡列宁娜》的时候，“甚至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是在思考，思考我所处的可怕的地位”，这“可怕的地位”指的是自己“寻欢作乐的特殊环境”。当时他不断想到死，也像列文那样，把绳子藏起来，不敢带枪支，怕的是自杀<sup>③</sup>。就这样，也像列文那样，进行着哲学上的、宗教上的紧张探索。列文的省悟，标志着作家的世界观激变的开端。有人说，小说里关于列文的结尾部分，带有给《忏悔录》作准备的笔记的性质。

列文的自传性质还表现在，他表达了作家的具体思想和感受，小说里的一切几乎以都列文的观点来衡量的。所以，小说可以

---

① Б·艾亨巴乌姆：《列夫·托尔斯泰（七十年代）》，第174、175—176页。

② 《索·托尔斯泰娅日记》，上册，第89页。

③ 分别见《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23卷，第494页，第41页，第12页。